



軍事戰略

以社會建構主義規範概念 探討美國與中國關係發展

空軍中校 蔡金倉

提

要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一方面將政策制定視為是行動者的選擇，一方面也強調國際體系結構的重要性，兩者具有同樣的重要性。本研究主要以建構主義來分析美國與中國關係發展。

關鍵詞：社會建構主義、認同與利益、互為主體

壹、前言

隨著國際戰略環境快速變遷，全球經濟因金融風暴影響，經濟衰退可能會導致多項經濟指標同時出現下滑，比如就業、投資和公司盈利，其它伴隨現象還包括下跌的物價（通貨緊縮）。當然，如果經濟處於滯脹（Stagflation）的狀態下，物價也可能快速上漲。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整體「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CNP）大幅提升，國防預算逐年增加，對國際社會所帶來之影響力，將使世界各國不得不重視「中國崛起」。

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計算，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第一為美國，其經濟總量將達16兆1979億美元；中國位居第二，GDP總量為9兆零386億美元。以此速度，中國將在2017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註1】

在「中國崛起」後，美國與中國（以下簡稱美、中）兩大經濟體系（G-2），儼然成形。2013年7月12日，第五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U.S.- 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在美國華盛頓舉行。兩國元首奧巴馬總統(Obama)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

經濟對話上，雙方就事關兩國和世界經濟的全局性交流。雙方承諾在「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G20)、「亞太經合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等框架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進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促進世界經濟復甦與增長。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1980年代末因蘇聯解(Soviet Union)體後，東歐與南歐共產國家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的研究，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建構主義理論學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我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註2】}。社會建構主義是以批評「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原則，來解釋國家行為與國際關係的互動關係。在社會建構主義中，「規範」(norm)與「認同」(identity)為社會建構主義所關切主題，是一種社會約定，包括規則、標準、法律、習慣、習俗等。「建構主義」把「規範」的概念定義為「規範行為體在給予認同中，適當行為之集體期望」；由於美中關係錯綜複雜(隱藏著台灣問題)，以下就社會建構主義「規範」之概念探討美中關係發展。^{【註3】}

貳、理論探討

一、社會建構主義：

(一)一個方法：

1.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方法，總體而言是一種社會理論，奉行的是「社會學方法論」(Sociological Methodology)，雖然各派有著後現代哲學的影子，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認為工人階級富裕起來以後不再是革命的動力，現在的革命力量是所謂的「新反動派」、「新左派」，包括懷有激進情緒的學生、青年知識分子以及某些受到排擠和被遺棄的社會階層。^{【註4】}同時認為現在的革命已不是社會革命，而是心理的或本能結構的革命

註1 陳世昌，〈GDP超越日本 中國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聯合新聞網》<http://news.cts.com.tw/udn/international/201008/201008170541493.html> 日期2011年12月28日

註2 賴炯良，〈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溫特社會建構主義觀點〉，(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2009年3月，頁295。

註3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揚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1月，頁27-28。



，因為人的本能受到各種社會文化抑制，不能自由發展，所以處於「異化」狀態，而要克服這些就要有非抑制的文化，建立一個沒有衝突的社會。

2. 所謂社會學方法論，主要是在相對於經濟學方法的意義上使用，前者注重於從社會化和制度化的宏觀總體出發，研究不依賴於個體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體系，後者強調個體在社會化中的主體性，關注個體的理性自私對於社會的基本決定作用。^{【註5】}社會建構主義雖然以社會學方法論個體主義，但仍著重社會化及其產物對於個體的構成性作用，並強調「國際社會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藉由國家之間所醞釀的「理念」(ideas)、「信念」(beliefs)、「互惠」(reciprocity)的連結、「勸服」(persuasion)的歷程及「信任」(trust)的互動，最終達成規範的形塑，承認國際規範不但因果性地影響行為體的外在行為，還構成改變行為體的內在利益與身份，同時也承認國際結構和國際規範隨著行為體的社會實踐也不斷地被改變。^{【註6】}

(二) 兩個階段：

1. 1980年代世界多極化進一步發展，跨國主義日益引起關注，長期為兩極格局辯護的新現實主義漏洞顯露，加之各種反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思潮泛起，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諾(Adorno)、馬庫色(Marcuse)及哈伯瑪斯(Habermas)等學者的社會理論，法國「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學者福柯(Foucault)的話語理論(discourse theory)、德希達(Derrida)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思想，葛蘭西(Gramsci)的「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對霸權(Hegemony)地位的以肯尼士沃爾茲(Kenneth Waltz)為代表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展開了長時間、多方位、大縱深的猛烈抨擊，至1980年代末期新現實主義已遍體鱗傷，它的基本概念如「無政府狀態」(anarchy)、「主權」(sovereignty)、「國家」(country)、「制度」(institution)、「權力」(power)、「利益」(interest)、「安全」(safety)等均被解構並賦予了新的含義，這長達多年的理論批判可稱為「解構階段」。^{【註7】}
2. 1989年前後，溫特意識到批判不能代替理論建設，應該在解構原有主流

註4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27-28。

註5 涂爾幹，《社會學方法論》，(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月15日。

註6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28-29。

註7 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頁31-33。



國際關係理論的同時，汲取各種理論包括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長處，將之發展為建設性而非批判性的「國際關係理論」(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進行一次國際關係理論的理論綜合，遂在「認識論」(epistemology)、「方法論」(methodology)等方面向科學「實在論」(realism)、「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國家主義」(statism)和實證主義(positivism)方面進行有限度的靠攏，建構主義學者包括瑪莎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凱瑟琳(Kathryn)，卡贊斯坦(Katzenstein)和溫特(Wendt)開始重視國際關係運行規律研究和實證研究，建構主義本身進入建構階段。

(三) 三次論戰：

1. 第一次是指1980年代以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身份，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加盟下，與新現實主義論戰，爭論核心是要不要社會進程分析，要不要國家中心主義，要不要實證主義。
2. 第二次論戰於198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中期展開，主要反對新自由主義理論，兩者的分歧主要在於制度是構成性，還是管制性，僅向行為體施以在約束外，還可以深入到行為體的認同與利益中去，這種影響是因果性還是非因果性的等等，實際上是新制度主義與舊制度主義之爭。
3. 第三次論戰是指1990年代的絕大部分時期內，建構主義內部形成了論戰的態勢，以阿什利為代表的後現代主義者，堅持建構主義原有的批判功能和激進立場，反對與主流理論進行方法論和認識論的妥協，而以溫特和彼德卡贊斯坦(Peter J·Katzenstein)等則持相反態度。【註8】

(四) 四大流派：

以阿什利(Ashley)為代表的一派為激進建構主義，溫特一派則可稱為主流建構主義，另外兩派一是以約翰拉格為代表的現代性建構主義，既反對徹底的後現代主義，也反對向主流理論的過分妥協，無意構築一個完整學說體系，最後一派是「女權主義」(Feminist theory)建構主義，它與以上三派均有聯繫，但更多地偏向激進建構主義，它認為國際政治本質很大程度上是由性別化的男性統治、社會態度及其互動關係而建構而成的。主流建構主義代表了社會批判學說與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間的某種理論融合，愈益引起國際關係理論界的廣泛矚目。【註9】

註8 明居正，《國際關係綜論》，(經典文化事業出版社)，2010年9月，頁126-130。



(五) 五塊內容：

建構主義的五塊內容大致可分為純粹理論、國家利益理論、國際體系理論、國際體系轉換理論以及國際和平理論。建構主義純理論是指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是統帥和指導具體國際政治分析的立場、原則和方法。建構主義的國家利益論認為，國家利益不是如現實主義所言由權力界定的，而是由認同或身份界定的，受到社會化和國際規範的巨大影響。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既是物質結構，又是文化結構，但是後者更具決定性，不同的文化結構構成不同的國際體系，國際體系存在著三種主要模式。

1. 霍布斯式 (Hobbesian) 的國際體系，建立在敵人角色認同結構之上。又稱古代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國家的消亡率很高，出現在17世紀民族國家體系之前，行為關係特徵是一種改變現狀。
2. 洛克式 (Lockean) 國際體系，建立在對手角色認同結構之上的。這種體系已有近400年的歷史，在當前的國際政治中仍居主導地位。洛克體系是彼此尊重主權的共存體系，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westphalian system) 是洛克式體系，行為關係特徵是一種維持狀。
3. 康德 (Kantian) 式國際體系，建立在朋友角色認同結構上。後現代的國際體系模式，初顯於歐美、大西洋地區的多元安全共同體當中，行為關係特徵是一種安全共同體。【註10】

二、規範概念：

規範屬於一種社會約定，包括規則、標準、法律、習慣、習俗等。建構主義者把規範概念定義為「意指對某個特定國家本體作出適當行為的集體期望」。^{【註11】} 建構主義認為，通過建構而產生出來的行為規範、原則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僅影響和規定著國際政治中國家行為體的具體行為、利益、優先選擇以及實現對外政策目標的工具，而且可以幫助行為體理解什麼是重要的或有價值的，以及如何運用合法手段去獲取它們。因此，「社會規範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們創造出行為模式」。在對國際體系變化的認識方面，建構主義不是根據在行為體背後起作用的實力分配和權力結構來看待國際體系，而是認為這個體系是由與規範有關聯的機構所組成。建構主義認為，這些機構使國際社會不

註9 明居正，《國際關係綜論》，2010年9月，頁126-130。

註10 明居正，《國際關係綜論》，頁125。

註11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2 23..



斷確立各種規範，並以此調節著各機構的活動和習慣，「國際體系是諸機構的集合體，而且諸機構是由諸規範所組成的實踐活動，當其構成的規範的一部分（或全部）發生改變時，國際體系的基本變化隨之出現」。^{【註12】}

在西方建構主義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不願意接受先前傳統的歐洲諸國家體系所確立的組織規則並打破了它們。當時的美國嚴重違反傳統的民族主權觀念，打破或改變約定的規範，造成以後長期的冷戰歲月。建構主義認為，國家的需要是通過社會規範、法則、理解和與其他者的關係而形成的。在決定行為體的行為方面，社會規範、法則、認同等與物質現實同樣重要、同樣有影響。^{【註13】}

參、美中關係演變

綜觀過去的美中關係演進史，概分「1949年至1969年相互敵視、甚至兵戎」、「1969年至1989年跨洋握手、聯手制蘇」及「1989至迄今化解紛爭、尋求合作」等三個階段。奧巴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清醒地認識到：「世界已經改變，我們必須與這個世界一起改變」(For the world has changed, and we must change with it.)。美中關係深具複雜性、廣泛性和多樣性，兩國和世界局勢的轉變，使得兩國政府都覺得有必要努力維護並推動建設性合作關係的平穩發展。

一、1949年至1969年：「相互敵視、甚至兵戎」

自從共產黨在1949年10月1日統治中國，在頭三十年中，美國並未外交承認這個政府。美國繼續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保持外交關係，並維持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中兩國關係急速惡化，但雙方都意識到對方的存在。

二、1969年至1989年：「跨洋握手、聯手制蘇」

(一) 美中三個聯合公報

1. 上海公報：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Nixon)宣布，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博士已經對北京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而他本人已經受邀訪問中國。1972年2月，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並簽署「上海公報」(Three Communiques)，使得兩國之間關係正常化，台灣問題被暫時擱置。

2. 建交公報：1979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宣布中國與美國建立正式的大使級

註12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出版社)，2003年，頁295-296。

註13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頁295-296



外交關係。美國在該公報中首次承認「中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就保留與台灣的非官方往來。

3. 八一七公報：於1982年8月17日簽署的，也是三個聯合公報中爭議最大的，中國一直認為美國沒有切實履行該公報中有關美國「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的承諾。

(二) 元首互訪：1985年7月，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訪問美國，這是中國國家元首對美國的首次訪問。1985年10月副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再度訪，並且設立了美在中國的第四個總領事館(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美中之間所進行的文化交流活動令兩國人民都對對方的文化、藝術以及教育成就都有更深的認識。

(三) 六四事件：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凌晨，中國人民解放軍首都戒嚴部隊對在天安門示威的學生及市民進行武裝鎮壓。此後，絕大多數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對中國政府的行為表達了強烈譴責。美國停止高層和官方的交流，禁止出售武器給中國，宣布對中國實施多項經濟制裁。

三、1989至迄今：「化解紛爭、尋求合作」

(一) 台灣海峽危機：1996年3月23日中國在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夕舉行軍事演習，被解讀為試圖干預在中華民國總統選舉。選舉期間美國出動了兩個航空母艦艦群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 CVL-22)和尼米茲號(USS Nimitz CVN-68)，兩航空母艦前往台海監視中國的軍事演習。在台海危機解除後，兩國關係也開始逐漸好轉，高層交流增加，雙邊會談取得進展，雙方在人權、核不擴散以及貿易領域進行雙邊談判。

(二) 中國大使館被炸事件：1999年5月美國轟炸駐塞爾維亞(Serbia)首都貝爾格萊德(Belgrade)大使館，引發中國民眾遊行示威，直到1999年末雙方關係才恢復。1999年10月兩國就賠償傷亡家屬及財物達成協議。美國僅承認是由於使用三年前的衛星地圖導致誤炸，但是大陸民眾普遍認為以美國的軍事、科技實力不會出現如此低級失誤，並不接受誤炸的解釋。

(三) 美中撞機事件：2001年4月1日美國海軍電子偵察機(EP3)在南中國大陸海執行偵查任務，中國大陸海軍航空兵派出2架殲8II型戰鬥機進行監視和攔截，兩架飛機在南中國海區域相撞，美方偵察機迫降於中國海南省，中方戰鬥機撞毀，飛行員跳傘後失蹤(後經確認喪生)。美機隨後迫降在海南陵水機場。經過磋商後美國總統布希寫信慰問當時的中國主席江澤民，即「兩個表示遺憾的信件」，美方人員在被拘留11天後返國。兩國關係也隨著此次事件的



降溫以及此後的一系列事件而重新恢復。

(四) 911事件：在911事件後美中關係從本質上發生變化，中國公開強烈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票支持第1373號決議，支持美國等聯軍對阿富汗(Afghanistan)的軍事打擊，並在塔利班政權(Taliban)垮台後向阿富汗提供了1.5億美元的人道救助，911之後美中開展了反恐方面的雙邊對話。

(五) 美國金融風暴：中國在2008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將人民幣兌美元匯價凍結在6.83兌1美元長達近2年，買進美元來阻升人民幣，以保持中國出口競爭力。這些美元最後都流向美國公債部位，躍居美國最大債權國。

肆、美中關係發展

國際關係環境存有秩序、規範、結構、制度、價值等共同文化與知識，而各「行動者」(國家)的動機與作為，會受到彼此之間的利益、衝突、期待、互信、依賴、互賴、制衡、對立和結盟等「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關係而有所影響。建構主義則是把國家和國際體系的互動結合，從國際國內的集體身份和規範的角度去審視國家的對外政策。

一、安全：

美中都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對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都負有重要責任。冷戰(Cold War)結束，美國、中國及蘇聯三角關係雖已不存在，但安全因素仍然在美中關係中佔有重要成份。因為冷戰後的世界並不寧靜，原有的一些問題還未消除，新的衝突熱點又已出現。隨著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它不得不更多地借助聯合國的影響來處理一系列的國際及地區問題。如果沒有中國的適度合作，美國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如在「波斯灣危機」(The Persian Gulf Crisis)問題上。在解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和「全球環境保護」(Glob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問題上，美國也需要中國的合作。

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方認為，自2000年以來，中國對美國所進行的駭客攻擊，不僅是針對政府部門，也對美國民間企業構成威脅，而成為現階段美國亟欲施壓中國解決的議題。在其他議題方面，雙方達成的共識程度則較高，主要包括：在經濟議題方面，美方重申希望中方繼續加強內部改革，也對中方願意與美方就高標準雙邊投資協定進行談判表示歡迎，而中方也強調希望美



方繼續為可持續及平衡的經濟增長而努力，並放寬投資限制等。在戰略議題方面，雙方認為亞太地區是建構新型大國關係的重要起點，並就氣候變遷、區域安全等問題達成共識。【註14】

二、經濟：

(一)經濟利益：

1. 經濟互補：美中兩國，一個是發展中的大國，一個是經濟、科技發達的大國，兩國都有廣闊的市場，經濟互補性很強。中國正致力於加速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更注重同美國在經濟、文化教育方面的合作。美國的資金、技術及管理經驗，對推動中國的發展無疑會起重大作用。
2. 勞動市場：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又補充美國的大眾市場，也有利於美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依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份調查報告說，如果美國政府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可能減少42%至96%，而為了支付取代中國產品的比較昂貴產品的價格，或是彌補對中國商品徵收的更高的關稅，美國的消費者可能每年要多支出140億美元。
3. 貿易逆差：中國對美出口已成為美國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順差」(Trade Surplus)之一，為美國巨額「貿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來源，美中貿易摩擦愈演愈烈，遍及紡織品、服裝、農產品、反傾銷、智慧財產權、人民幣匯率安排等諸多領域，美中兩國發生經貿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國家。中方多次指出，美中貿易不平衡問題很大程度上源與美國對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嚴格限制，美中貿易嚴重失衡應通過更廣泛的開放的經濟合作來化解，而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施壓。美中經貿關係是在磨擦中前進，而不是在磨擦中倒退的。

(二)人才交流：

美中之間還在科技、文化教育領域進行廣泛合作。中國達10萬多人的留學生和學者到美國接受高級培訓和從事研究工作。同樣，也有許多的美國學生和學者來中國學習和從事語言研究、參加科研合作項目或在高等學校任教。美中之間的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不僅促進了兩國科技和經濟的發展，增進了兩國專家、學者之間的了解，而且也有力地推動了兩國政治關係的發展。

註14 盧業中，《第五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評析》，(亞太和平月刊第5卷第8期)，2013年8月19日 (<http://www.faps.org.tw/issues/subject.aspx?pk=361>檢索日期2014年2月20日)。



三、民主：

民主是美國三大核心價值之一，美國近年來不斷指責中國人權狀況惡化，「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劉曉波等一批人權活動人士被關入監獄，陳光誠等維權人士被迫流亡國外；另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也在惡化，新疆連續發生暴力襲擊事件，西藏和藏區則已經有超過120名藏人自焚抗議。地下教會繼續受到當局的限制和打壓，中國要求教會聽令於北京政府的立場導致中國和梵蒂岡(Vatican City)之間的分歧尚無法癒合。「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 HRW)還指責中國打擊言論自由，對互聯網進行過濾以及要求網絡實名制等，將中國稱為「互聯網公敵」。人權組織曾批評美國政府為了爭取中國在經濟事務以及朝鮮等國際問題上的支持而未能在人權問題方面對中國施加足夠壓力。^{【註15】}人權問題是美中關係中的一部分，兩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還會存在，但是並不影響美中在其他問題上的合作。

伍、結論

從整國家利益來看，美國國家利益為第一，保護國家安全，生死攸關利益；第二，維護歐亞大陸的大國和平高度重要。美國一直將維護國家安全和獨立放在外交政策的首位，長期以來運用靈活、實用的外交政策，維護國家的獨立和利益。美國國務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發言人克勞里(Philip Crowley)曾指出，在雙邊關係、區域及全球議題上，美中關係中，如果美中兩國沒有採取果決且協調的行動，世界經濟將很難復甦。

美中關係有時會出現緊張，兩國不會每件事都看法相同，雙方可以坐下來進行坦誠的討論，讓彼此了解對方的想法，共同找到建設性的方式來化解雙方之間的緊張。而美中兩國能夠恢復有實質效果且透明的軍事往來，讓雙方能夠更了解彼此的國防政策目標及企圖、軍事運作及其地點，透過這些交流，避免發生誤解及誤判。

建構主義認為，行為者的身分與規範，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二十世紀初迄今，美、中保持距離、甚至是敵對關係，但隨著國際局勢的改變，兩者又恢復成傳統的友好關係。根據建構主義的內涵發現，國際政治的社會結構不僅影響個體行為，也建構社會行為者的認同和規範。所以區域政治上，對中國而言，可借助美國提

註15 BBCh新聞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07/130727_us_china_rights.shtml (檢索日期 2014年2月16日)



升其在國際地位；另中國希望美國能夠理解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無助於解決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只能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商品代替大陸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對中國而言，美國樂於中國能夠融入全球經貿體系，擴大互惠的經貿關係，兩者具有政治的共同利益。

總體來說，美中戰略穩定既不可能走美蘇關係(美蘇之間恐怖平衡模式)的老路，也難以複製美歐、美日關係的模式。中國所追求的美中戰略穩定關係，應該是在全球化條件下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科技發展、軍事實力之不對稱，經濟依賴加深條件下的新型戰略穩定模式。

參考文獻：

一、一般書籍

- (一)包宗合等，《國際關係辭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3月。
- (二)江春琦，《國際關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8月。
- (三)涂爾幹，《社會學方法論》，(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月15日。
- (四)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五)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 (六)莫大華，《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時英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七)秦亞青，《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2006年。
- (八)秦亞青，《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 (九)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揚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3月。
- (十)張亞中，《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生智文化)，2000年。
- (十一)張亞中，《歐盟全球戰略與對外關係-國際關係研究叢書》，(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2006年10月。

二、學術論文

- (一)台日非官方戰略對話，〈日本戰略研究論壇對亞太安全及台灣發展的觀察〉，《台灣智庫通訊》，2002年Vol.3。
- (二)朱新民〈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第五屆兩岸文化論壇》。
- (三)陳曉航〈從建構主義觀點論兩岸衝突與合作之研究〉《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四)盧業中，〈東協區域合作：國際關係理論的再檢視〉《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12期，2004年。
- (五)盧業中，《第五輪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評析》，(亞太和平月刊第5卷第8期)。
- (六)賴炳良，〈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溫特社會建構主義觀點〉《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3月。

三、英文文獻

- (一)Alexander E.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demational State.
- (二)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四、網頁資料

- (一)BBC中文網<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
- (二)中華民國外交部<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Index>
- (三)陸委會<http://www.mac.gov.tw/mp.asp?mp=1>

作者簡介

空軍中校 蔡金倉

學歷：空軍通校83年班、空軍指揮參謀學院98年班，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現職：空軍戰術管制聯隊。